



由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决策过程看19世纪中期英国代议制特点

○ 邢新宝

英国代议制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的几套高中历史教材都专门设有一节专门讲述英国代议制的内容,尽管课题与内容编排不尽相同,但就英国代议制的特点来说,大致都包括以下内容:君主立宪制是主要形式,国王“统而不治”;议会是权力的核心,责任内阁对议会负责;内阁首相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其形成具有渐进性。其中前三点不难理解,但对于英国代议制形成的渐进性,各版本教材都只做了简单的论述;在一些重要时期,英国代议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古今中外的贯通,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同时期中外历史的联系是近些年高考命题的关注点。挖掘中外历史之间的联系,对于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推进高三备考的有效性都是大有裨益的。关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工业革命后,英国要把中国作为其倾销商品的市场及原料产地的结果,是世界市场不断扩展的结果^[1]。这一观点在初高中各个版本教材中都有体现。而英国做出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笔者试图从英国做出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决策过程中的几个视角,管窥19世纪中期英国代议制的运行特点。

一、在议会辩论中“反对只是目的”,两党本质相同

英国议会关于是否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提案的争论首先在下院进行。1840年4月7日到9日,英国下议院就是否对华宣战一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执政党议员认为,中国方面对贸易的遏制态度、对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威胁等,英国必须做出强硬的回应。但反对派认为,不能支持这样一个有伤道德的贸易,以此发动战争更是可耻的行为。最终,执政党的现实主义击败了反对派的道

德谴责,下议院以271票对262票通过了发动战争的决议。

从表面看,支持发动战争与反对发动战争只有九票之差,甚至有人认为,就是“这九票之差,决定了鸦片战争”^[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反对派并不是真的反对发动鸦片战争。在英国的议会政治中,“‘反对’是反对党这种政治动物的天然职责和政治本能。用最简单的话说,‘反对’本身就是目的,至于反对的到底是什么,那是其次。反对党可以用一个理由反对执政党的某个政策,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同样的政策”^[3]。后来的历史发展事实证明,这些当时大谈仁义道德、抵制对华战争的反对派,对战争的狂热程度一点也不比执政党差。在战争期间,墨尔本内阁上台执政,顶替巴麦尊出任外相的是阿伯丁。中英鸦片战争第二阶段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战争行动,以及后来严苛的中英条约,都是在皮尔、阿伯丁等人的主持下完成的。“等义律拿出《穿鼻草约》之后,不但辉格党组成的内阁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托利党也表示强烈不满。两大敌对党派居然空前统一,一致认为义律所争取到手的远远不够,英国必须扩大战争云云”^[4]。

以上事实证明,尽管英国两党在下议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在发动鸦片战争的立场上,两者本质上分歧并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托利党渐渐改变了原先的守旧态度,开始关心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吸收个别工厂主为其成员。1832年议会改革过程中,原先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更名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而政党名称的改变,背后隐藏着两党的深刻变化。“托利党和保守党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对待工业化和政治变革的态度上。旧托利党人最关心的是地产业者的利益……对工业化和议会改革持敌视态度。而皮尔领导的保守党,





承认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变化,开始关心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5]296}。辉格党则进一步加快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融合,大量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加入辉格党,辉格党中的贵族也进入工商界。这样,托利党、辉格党不仅更换了名称,也更加关注工业资产阶级,加快了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融合。两党阶级基础的日益接近,有利于他们对外国市场、原料等经济利益的关注,使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达成妥协,从而有利于发动战争议案的通过。

二、议会上院成员在转型,下院则是权力的核心

下院辩论通过之后,“同样的辩论在上院也演出了一番”^[6]。“上议院的政治斗争远不如下议院那么激烈,这是因为在上议院的党派人士中,执政党议员总是占多数,而反对派议员只是偶尔才达到1/3,而且与准备充分的执政党议员相比,反对派议员总是难以匹敌的,因此任何政府都可以在上议院轻易获得支持”^[7]。上院的辩论更虚伪了,因为上院基本成了养老院、帮闲院,大家仅是握握手兼敲敲掌罢了,有辩论也是闹着玩的^[6]。就这样,关于鸦片战争的议案,在上院顺利通过。

上院之所以顺利通过该议案,有深层次的原因。“1832年的改革法动摇了上院的权力基础和基本利益”^[8]。首先,把投票权扩大到中、下层阶级,随后的立法就要考虑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其次,取消了上院提名下院成员的权利,使上院失去了对下院构成的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传统的英国贵族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具有现代经济头脑的英国贵族未把自己束缚在农牧场里。他们在资本主义利润的吸引下,投身其他领域,在工业化商业化的新天地中大显身手……大量事实证明,在近代绝大多数时间里,英国贵族阶级能够适应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不断增加自身资本主义化程度”^{[5]278-280}。此时的英国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至在追求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尤其是涉及对外侵略的问题上。比如当时积极推动鸦片战争的首相墨尔本、外交大臣巴麦尊同时都是子爵身份,贵族出身。

三、国王依然有较大影响力,内阁需要国王支持

当时英国政治上虽早已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对议会负责,但拥护王权的贵族势力十分强大,

两党竞争机制也不完善。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她“依然掌握着任免首相和解散内阁的权力,还是不列颠陆军总司令货真价实的上司”^[9]。按照传统惯例,她应该超然于任何党派,处理好与议会和首相的关系。但年轻气盛的女王却常常独断专行,于是辉格党党魁、从政三十余年的墨尔本首相,经常与女王悉心交谈,很快成了她的好朋友。同时为了更大程度争取王室对内阁的支持,墨尔本还把女王寝宫中的侍官换成清一色的辉格党贵妇。于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潜移默化中在政治上采取了辉格党的立场。因此,英国讨论是否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也是维多利亚女王受当时的执政党——辉格党影响较深的时期。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讲:“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通商关系中断。我对其极其关注,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臣民利益和王室尊严的事件。”^[3]维多利亚女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但从措辞强硬、对事件的“极其关注”“并将继续注意”中,我们不难看出女王的真实思想。

女王甚至还要求首相必须明确禀报她要处理事务的实情,并且在她做出决定后不得随意更改,否则便是不忠。她对墨尔本之后的每一位首相几乎都不满意,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随着英国贵族势力日渐衰微和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女王才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解散内阁或者任免首相。

由此可见,19世纪中期的英国代议制已经基本形成:议会下院是权力的核心,内阁对议会下院负责,上院已基本成为摆设;两党制也已基本形成,并且日益趋同;国王虽然“统而不治”,但仍有一定影响。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英国的代议制这两个问题,教师往往是各自分开讲得都很透彻,但缺乏对于二者之间联系的挖掘。新课程理念要求教师必须“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中学历史教材中有很多核心知识点,教师如果能够在教学教研过程中,发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清其中的来龙去脉,这就吃透了教材,做到了“用教材教”,也是践行“历史解释”这一核心素养的有效渠道。特别是对中外历史的联系解读,不仅有利于教师对知识的整体把握,也有利于学生将中国史与世





○ 刘波 陈德运

学为求真与致用： 顾颉刚历史教育民族主义观转变

学术研究旨趣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学术是为了求真，还是为了致用，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是二者兼有，又如何可能。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此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方式不一。选择前者，学术似乎失去存在的理由；选择后者，则可能以牺牲学术为代价。现实的学术研究中往往是各走一端，各遭到对方批评。顾颉刚先生在对待历史教育民族主义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处理二者关系的重要遗产。他认为承平之世，学唯求真，战乱之际，学须求用，甚至强调“知识分子从事救亡工作之少实为知识界之耻辱”^[1]。

一、学术“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20世纪20年代，“求知”与“应用”的学术旨趣在顾颉刚看来，虽有关联，却是两条不同的大路。“要是由应用上着眼，那么学术原是很浅近的东西”，如若“改由求知上着眼，那么学术乃是极深邃的东西”。所以，他认为学者“就是要造成了一个学术社会而去共同讨论”，故而在研究时“心里所想到的只是这一小部分中的材料如何可以整理清楚，如何可以解释里面的种种原因，却绝对不想到把这些

界史知识点的融会贯通，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东西拿来应用”^[2]。

顾颉刚的很多著作都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他编制的历史教科书。1922年，他在谈及编纂中学教科书时，认为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等同学术专著，也应求真。因此，特别强调历史教科书“应当举出史学的真义来”，并且对之前的历史教科书予以批评，认为现在人心目中的“好古而薄今”观念、“三代为黄金时代”的看法，是由于不去寻求史料、不去审定史料造成的。由此，他认为编写教科书时要“把这观念改变过来，所有‘依托的学说’，如黄帝、管仲，‘理想的制度’，如封建、井田，‘混淆的事实’，如儒、道、墨并尧、舜，而取舍不同的故事，如‘想当然耳’的故事，都应当彻底澄清一下，使大家弄清楚每一时代和每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形，建立成功一个新观念”。考虑到教科书的分量较小，顾颉刚认为在剪裁上“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欲不可使选择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3]。于是，在1922年《本国史教科书》编写中依据“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是一个反背”，得出“三皇五帝不存在”的结论。可见，在顾颉刚心中，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是学术研究，在历史教育民

社，2003。

- [1] 葛夫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J]. 史林, 2016(5).
- [2] 马谧挺. 微历史: 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135.
- [3] 瞿巍. 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45.
- [4] 端木赐香. 1840: 大国之殇[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136.
- [5] 阎照祥. 英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

- [6] 端木赐香. 那一次, 我们挨打了: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98.

- [7] 项焱. 英国议会主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51.

- [8] 胡康大. 英国议会权力的转移及其特点[J]. 西欧研究, 1991(4).

- [9] 张献军. 铁血君主维多利亚女王[J]. 世界文化, 2012(5).

(作者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050000)

